

第一章

反思正义的视角与方法

在西方政治哲学史上，女性主义反思传统正义论首先面对的是极具统治性的主流政治哲学，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正义论已经确立稳固的主导地位。这既为女性主义的正义思考提供重要的理论资源，又为女性主义的理论建构设置了诸多障碍。在这种背景下力图超越主流正义论的局限性 创建无性别偏见的女性主义正义论 既不能简单地否定男性主导的正义论，更不能沿袭传统政治哲学的视角与方法。女性主义的正义思考只有转换视角，从方法论上重新审视主流正义论的弊端 揭示其理论内涵的性别偏见 才有可能破除男性正义论的各种前提条件，以实现女性主义的理论创新与正义抱负。为了便于理解这种新型的理论反思与建构，我们需要首先考察女性主义正义论的方法与视角，以便理解女性主义者对罗尔斯正义论的各种评论 也有助于把握女性主义正义论独有的特征。

1 经验论方法与背景视角

女性主义的经验论方法是一种独特的认知态度。从广义上讲，它坚持政治哲学只有为女性的现实经验证实后方可接受，并转化为人们行为的指南；狭义是指，正义观念必须与特定的性别经验相联系，正义理论以及各种原则归根到底需要在女性的生活经验中得以检验。这种方法从女性的生活经验出发 以现实的性别背景为依据，重新评价女性行为的价值 检验主流正义论的性别偏见 以便“发现”

传统经验论方法难以获得的性别歧视真相。

1. 1 “坏科学”及其缘由

人们通常认为，科学总是通过严格的假设和测试排除各种假象与偏见，揭示事物的本质。尤其是经验论方法，总是通过经验来证明或推翻各种假设。从女性主义观点看来，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不仅不应该包含性别偏见，而且还应该用来分析现实制度的性别根源。确切地说，现代科学的核心问题和方法是父权制为解决女性化问题而创立的^①。正是为了消除女性特征，男性科学家发展了科学以及科学的方法论，其中必然渗透着男性的观点与认知。科学家们习惯于从父权制的现实出发，提出假设，收集证据，进行具有性别偏见的推理，最后得出维护父权制社会的结论。由此形成的科学，女性主义称之为“坏科学”。

以客观的中立性否定女性行为的价值及其科学认识，是“坏科学”得以形成的原因之一。在现代科学研究中，人们普遍相信科学研究具有客观性，因为它总是以价值中立的方式获得真理。但这是一种错误的信念，因为价值中立恰恰是隐含性别特征的表现。在父权制传统中，不偏不倚的客观性一直被认为是男性的特征，女性则被认为是情感的化身，与科学真理无关。在男性社会科学方法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将母亲养育孩子的经历与情感排除在科学认知的大门外，女性不能成为科学认识的主体。

伊夫琳·凯勒指出，问题在于“科学认知的要求……来源于情感的基础，而这种情感基础需要母亲单独抚养孩子的经验来说明”^②。

^① Sandra Harding,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40-141.

^② Evelyn Keller, *Reflection on Gender and Sci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96

桑德拉·哈丁也认为 科学中的‘客观性’概念是以排斥女性为基础的 它不仅表达了男性科学家拒绝女性并试图统治女性 即自然 的需要 而且 科学家们还会据此确认“女性的日常生活是如何妨碍男人形成男性世界规则的”^①。在这个一意义上 不论是“客观性”还是“中立价值”都排斥女性独特的性别实践与科学认识 原因在于她们从事的活动具有自然特征，男性科学家据此否定她们的全部行为价值。

原因之二“坏科学”通常是在孤立而狭隘的视角下形成的。女性主义认为 传统科学大多由非女性主义科学家创建 他们都 已经摆脱了自身负担及周围环境的限制，其局限性在于只能看到与自身抽象的精神世界相一致的事实”^②。这使他们的科学理论只关注与男性生活相关的主题，排斥女性的生活经验，忽视性别歧视日益加剧的趋势。从表象看，科学家对真理的探索似乎很严格，他们的理论研究似乎也检验了性别问题及其失误，但由于视角与方法的局限，由此建立的理论仍然包含太多的歧视和偏见。正如哈丁指出的：

有一种不同寻常的观念，即热心科学的人拥有适当的途径认识科学的历史和实践。据说，这是一种孤立的社会行为，只有通过热心科学者对自己实践的理解才能认识它——以“本地人”对自己的信仰和行为所做出的无意识的、非批判的解释来认识它。这就是说，科学家描述他们的活动 科学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解释这些描述 从而使我们能够运用道德、政治与认识论的术语 科学家正是用这些术语解释自己寻求资源与科学批评的行为，理性 地解释科学知

① Sandra Harding,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44.

② Ibid., p. 156.

识的发展。^①

人类认识史发展至今，作为现代社会最新标志的各种科学都充斥着对女性的偏见。各种“坏科学”将历史上普遍的性别偏见带进实验室与理论研究、调查过程与解释分析，却忽视研究对象的实际状况。男性科学家和哲学家只是根据自己的兴趣、期望和研究方式对不同的价值做出取舍，使研究结果受制于研究动机，进而形成重男性价值、轻女性价值的科学与哲学理论。哲学家们都承认女性拥有独有的本体论，并通过女性的存在确认其价值，还借此证明把女性排除出公共领域的合理性。可是，男性理论家从来不承认女性独立的认识论。这就有理由认为，以客观中立面目出现的科学理论其实具有明显的男性特征。

据此观察罗尔斯的正义论，尽管其契约论方法不同于传统的经验证明，但是，它们都具有“客观性”的特征。契约论的价值中立更具有抽象的普遍性。假设原初状态与“各方代表”的特征，正是为了维护这种普遍性，无性别的“各方代表”事实上具有明显的男性倾向。正如桑德拉·哈丁所说的，如果我们把现时代的科学看做“经济、政治和社会控制的直接发生器”^②，那么，这种“发生器”的控制者都是“男人”。正是在这种不经详细考察与论证的“客观”前提下，“男性”成了全人类的原型，也成为正义理论的人性依据。

简·弗拉克斯从理论研究的视角揭示了同样的道理，她告诉我们：“在多样化的文化及话语体系中，人们很容易认为，男人已经从性别关系中解脱出来……当研究性别关系的女性担心会引起人们的猜忌时，男性学者不需要担心人们会歪曲他们的智力劳动成果”^③。的

^① Sandra Harding,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p.35.

^② Ibid., p.16.

^③ Jane Flax, “Postmodernism and Gender Relations in Feminist Theory”, *Sign*, Vol. 12, No.4, 1987, p.629.

确 从这个角度审视当今的政治哲学 主流理论家作为现时代理论的操控者，基本上都是男人，他们不需要考虑性别因素对理论的影响。罗尔斯的正义论便是一例 他的理论假设回避性别正义问题 也没有考虑性别因素会影响道德的内涵，影响正义社会的前景。

女性主义认为 男性理论家至今依然陷于各种性别误区 从而使人们对女性的科学认识受到了“污染”女性的经验遭到贬斥 女性的现实不平等长期无人关注。政治哲学理应论证所有人的自由价值与平等的权利 但由于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 学者们习惯于以歪曲和埋没女性的方式提出问题 设计方法 收集并解释材料 而对涉及性和性别的话题只字不提。南希·赫希曼认为 这是科学研究方法的错误，“性别偏见限制了思想的内容与结论”^①。

相比较 包容‘女性’的科学能够从事物本身的特征出发进行实验与研究，而不是先人为主地将某些研究主体与对象排除出去。这样的科学意在揭示‘文化的性质、价值以及作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幕后’证据假设的作用’^②。女性主义正义论需要引进的正是具有包容性的经验研究方法，这就是女性主义的经验论方法。这种方法不是墨守成规地遵循传统教条，也不是从某种已有的成见出发进行科学研究 而是深入生活本身 揭示那些流传已久的陈规陋习中被人们忽视或无视的真实生活状况 揭示那些被歪曲的事实与关系 把那些无人关注的知识缺陷揭示出来 如性别偏见、女性的消失、父权制和种族偏见等 以建立更具包容性的科学理论。

为此 女性主义经验论者呼吁 应该回归到真正无偏见的政治哲学与方法论的科学使命中 在科学的基础上为‘女性主义’提供一条

^① Nancy Hirschmann, *Rethinking Obligation: A Feminist Method for Political Theo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94.

^② Sandra Harding, *Whose Science? Whose Knowledge? Thinking From Women's Liv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15-16.

通路。女性主义正义思考的经验论方法有助于科学地研究女性的经验与情感 重新评价女性的行为价值 这是“一种有利于恢复、宣扬、规范女性对人类文明贡献的方法”^①。正如洛克、休谟和密尔的经验主义认识论来自于对现代科学成果的解释，女性主义的经验论方法也同样具有这种认识功能，它可以揭示男性视角下无法发现的事实。

从这个意义上说 女性主义的出现是一场社会革命 正如资产阶级革命一样，它以极其深沉的方式扩大了观察社会的视角。在对世界奥秘的探索中，“科学家”的名称似乎已完美地融合了理性与性别。^②女性主义学者将揭示“研究者”和“认知者”的“政治身份”把性别偏见和歧视引入正义哲学的研究，这具有革命性意义。她们相信，通过“政治化”的研究，可以揭开“覆盖在知识和观察之上的蒙蔽物”^③。当女性主义经验论者开始思考这些问题时，实际上为科学的理性开辟了一种崭新的认识空间。

1.2 “自下而上”的背景分析

女性主义的经验论方法不仅针对传统经验论，同时也针对当今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正义论方法。所有的契约论推理都具有抽象的特征，罗尔斯的契约论把这种抽象推到了更高的程度。由于主流政治哲学对正义的解释是父权主义的，使得这种高度抽象的理论方法无法体现女性主义的正义观。女性主义的经验论方法可以补充抽象方法的缺陷 尤其是那些具有亲和力的文学形式 包括叙述、自白、解释

^① Christie Sylvester, *Feminist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Postmodern Er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30.

^② Sandra Harding, *Whose Science? Whose Knowledge? Thinking From Women's Liv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p.19.

^③ Maria Millman and Rosabeth Moss Kanter, eds., *Another Voice: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Social Life and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75, p.vii.

和虚构故事等 都是研究女性历史的有效方法“，这是一种重背景的、具体的、而不是形式的抽象方法”^①。吉里根认为 叙述对于挖掘和界定女性的不同意见是十分重要的，女性主义理论家必须关注她们自己的政治故事。这些故事有助于阐明女性主义的认知方法，而抽象理性的哲学分析则难以充分揭示这类故事。苏珊·欧金也认为 女性主义经验论有助于批判主流哲学方法论，这种批判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对不恰当的理论抽象提出批评。所谓不恰当的抽象 指当代正义论方法的抽象程度太高，在道德上忽视相关群体的经验和差别。罗尔斯的正义论通过“原初状态”的假设 推论出两个正义原则，恰恰忽视了女性以及女性的经验在这种推论中的地位和作用。伊丽莎白·基丝认为 正义论需要关注女性的经验与需要 就有必要关注“更多的背景 应该采用‘由下而上’的探讨方法 从人类具体的经验出发构建这种正义的推论”^②。

这种不恰当的抽象不仅存在于当今的正义论中，同时也存在于传统正义论的研究方法中。欧金指出，社会契约论通过成年人的思想“实验”来探讨社会利益与负担的公正分配，这种方法忽视人类相互依赖的普遍经验；忽视女性受伤害的经历；也忽视了家庭生活领域的价值。“原初状态”假设的种种条件都是理想的正义环境所必需的，但并非实际存在。问题是，理论家们通过“抽象”获得的正义原则往往会影响其具体的内容，必然排斥女性的正义要求。许多运用这种方法确立的正义理论，都“看不见”女性存在的位置。

① Nancy Hirschmann, *Rethinking Obligation: A Feminist Method for Political Theo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p.247.

② Elizabeth Kiss, “Justice”, in Alison M. Jagger and Iris Marion Young, eds., *A Companion to Feminist Philosophy*, Oxford: Blackwell, 1998, p.493.

了解这一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女性遭受如此大的伤害和剥削。正义理论家却没有予以特别的关注。对“性”进行不恰当的抽象，如“原初状态”中“各方代表”不知道自己的性别，会使女性遭受的伤害和剥削变得模糊不清，就像“各方代表”的性别一样是“看不见的”。

女性主义的经验论方法正是要纠正这种不恰当的抽象。弗杰尼亚·赫尔德对未来正义社会的证明方法与罗尔斯截然不同。她关注的不是假设的理想状态下“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生活中“具体的人”，尤其是生活在家庭领域的女人。在她设想的正义社会中，“孩子与母亲的关系”是正义社会的基础，他们之间充满了丰富的情感与具体的责任，而不是抽空了具体生活经历的“各方代表”。尽管这种方法在某些方面难免偏颇，但对于纠正罗尔斯过于抽象的推论方法具有独特的作用。

其次，具体的生活背景分析。在女性主义者看来，正义理论家在进行理论构建时，事实上还是需要从具体的生活背景出发。这就需要具体的生活经历进行分析。任何一种正义论构建，都需要在想象中与“具体的他人”遭遇，而不是遭遇“普遍的人”。^①虽然苏珊·欧金在某种程度上认同罗尔斯“原初状态”的假设，但她的论证基础却是人类具体的经验和差异，尤其是女性的经验与性别差异，并把它们作为正义论的核心内容。这就是基丝所说的“自下而上”的理论抽象。通过这种“抽象”，女性主义把个人“叙述”纳入理论构建中。卡罗里·帕特曼则认为，契约论的抽象推论遗漏了重要的具体背景分析，这就是“性的契约”。

女性主义的经验论方法需要的是女性受压制的具体经验。为了弥补抽象方法中具体经验的不足，艾莉斯·尤恩概括了“五个方面的”

^① Susan Okin, *Justice, Gender and the Famil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9. p. 101.

不正义(剥削、边缘化、剥夺权力、文化霸权和暴力)①。与主流理论家们相比,她更多地关注社会不正义的具体表现,关注现实社会中处境最不利者的状况,尤其关注他们的经验与感受。这些具体的不正义形式源于不利地位的群体和女性的生活经验,尤恩是从具体事实出发证明抽象的理论,而不是相反。

再次,批判不恰当的抽象方法,并不意味着全然否定理论抽象,也不代表女性主义的经验论方法可以回避抽象,更不是说,从女性主义的角度看,凡是关注具体背景的正义论一定更好。事实上,任何理论构建都离不开抽象,女性主义在建构其正义论时同样需要某种程度的抽象,例如,审视性别等级制本身就是一种理论抽象。女性主义主张所有人都需要得到平等的关怀,主流正义论主张所有人都要追求他们的自身利益,前者的抽象成分并不比后者少。欧金在《性别、正义与家庭》一书中比较罗尔斯和迈克尔·沃尔泽时指出,“一种更抽象的正义论比更注重具体背景的正义论能够为女性主义提供更多的理论资源。”即使当后者对性的问题表示更多关注时,前者依然有更大的理论价值。因此,女性主义在构建正义论的过程中,并没有彻底抛弃“抽象”方法,而只是避免像罗尔斯那样过度的抽象,留心观察某些被遗忘的东西,更多地关注女性的具体生活背景,把这些背景作为检验正义哲学及其真理的标准。

由此不难理解,女性主义经验论方法关注女性的历史经验,尤其是作为母亲和女儿的经验,以及她们对自己“无权力”的前景的感受,这为女性主义的正义论提供了一个建设性的分析框架。通过这种具体的背景分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父权制是如何塑造“女性特征”的,同时,背景分析方法也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点,以重新审视现行的正义论。

① Iris Young,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ch.2.

1.3 发现“被遗忘的”经验

注重生活背景的分析，可以发现传统经验论方法发现不了的事实与女性的现实处境。自由主义理论家只看到“男性”经验中的积极因素，如男性的个性心理、男性的行为选择等，只看到“女性”经验的弱点，如情绪化、过分认同、权力弱化等。通过传统经验论方法构建出来的正义论总是谴责女性的经验，肯定男性经验，把正义理论建立在男性个人的基础之上，将正义的目标锁定在男性的需要上。

具体的背景分析方法从已有的正义背景中“发现”被“遗忘的”的生活经验。通过这一方法，女性主义者对科学通常忽视的问题引起警觉，她们发现自己经常能听到“证明的背景”、“假设的验证与证据的解释”，但听不到“发现的背景”。而后一种背景恰恰可以对研究问题做出准确的认同与界定，使理论研究受科学“规则”的指导。哈丁指出：

传统的经验主义并没有引导研究者把自己的研究主题定位在同一批判层面上。因而，当非女性主义研究者搜集证据、捍卫或反对这些假设时，这种缺乏指导性的“科学方法”是不可能发现并消除男性中心主义的，而这种男性中心主义却决定了研究的进程。^①

女性主义经验论方法的出现，使科学实践中的“发现”与“证明”之间开始出现融合的趋势。过去和现在的许多著名科学家在著书立说时都忽视这个问题。玛丽亚·米尔曼认为他们“都有一种令人不快的、夸张的、具有控制性和操纵性的男性风格”^②。赫希曼则认为：

^① Sandra Harding,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84.

^② Maria Millman and Rosabeth Moss Kanter, eds. *Another Voice: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Social Life and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75, X vi.

“ 尽管女性的经验并不是普遍性的 然而研究女性过去与现在的经验 仍然是有用的，因为她们的经验对社会现实和政治理论都很重要。’^①虽然女性主义经验论者不一定代表经验主义的最前沿，但她们的的方法不像常规科学的经验‘证明’那样 存在着如此多的性别问题。一般的统计程序需要研究者按照离散或孤立的变量进行思考，这些变量之间可能是相关的，也可能是不相关的。女性主义经验论方法需要我们考虑的是 假设这些变量既相互关联又彼此独立 那么科学的想象又能做出怎样的虚构呢？各种相互关联的男性特征是怎样影响社会正义目标的？不同主体间对正义论的理解，或者对正义的人际关系的理解又会怎样呢？传统经验论方法并没有对此类问题引起重视 导致经验论方法中‘经验的缺失’。女性主义试图改造‘坏科学’就必须关注‘经验主义认识论中经验的缺失’^②。

考虑到主流正义论研究中‘经验的缺失’有必要填补这一空缺，用女性特有的生活经验与认知方法证明传统正义论的性别偏见是不合理的。通过经验论方法 对人类活动进行具体的背景考察 可以发现‘女性’的生存空间 尤其是她们从事日常生活行为的价值 例如，家务劳动的价值。南希·哈特索克指出 这一发现的意义在于“如果人类活动的制度结构产生了本体论和认识论，如果女性的活动整体上区别于男性的活动，那么我们必须问认识论是否也具有性别结构’^③。

① Nancy Hirschmann, *Rethinking Obligation: A Feminist Method for Political Theo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75.

② Sandra Harding,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p.26.

③ Nancy Hartsock, “The Feminist Standpoint: Developing the Ground for a Specifically Femin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Sandra Harding and Merrill B. Hintikka, eds., *Discovering Reality: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Epistemology, Metaphysics, Method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Dordrecht: D. Reidel, 1983, p.238.

认识论来自本体论 认识的方式来自存在的方式。“女性”长期被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她们意识不到自己就是现实社会中正义的实践者 她们承担的责任 为社会正义奠定基础。她们甚至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日常行为调节着正义的社会关系 进而也可以成为正义理论的建构者。男性‘科学家们’对女性在公共领域与政治哲学中的作用不感兴趣，女性主义经验论方法告诉我们，如果仅仅采用常规的、缺乏性别的眼光去建构正义理论“，我们就会预期进入由男性尤其是精英男性绘制的社会图景”^①。

在属于‘男性’的正义领域中思考女性的地位与作用 在方法论上具有突破性的意义，它启示我们必须把这种思考所获得的结论归入“发现”的范畴 而不能归入传统的‘证明’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性主义的经验论与其说是一种‘证明’的方法 毋宁说是‘发现’的方法。正是这种‘发现’弥补了传统经验主义“证明”方法中‘经验的缺失’也避免了契约论方法中的性别问题。用迈克尔·尼科尔森的话说“，特定的方法适合回答特定种类的问题 但是如果这些问题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被认为是不合理的，那么这些方法也就变得多余了”^②。

女性主义对性别正义的经验研究需要这种‘发现’的方法。考察传统经验论的‘证明’方法与契约论的抽象方法 很容易发现其中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反差：一方面是‘非问题化’的性别假设 另一方面，从这些假设出发‘证明’得来的却是有问题的结论 例如 缺乏性别意识的哲学理论都一致默认某些‘严谨的’非性别假设 却从来没有一种政治哲学对女性受压迫的地位与男性统治之间进行相关研究，没

^① Cynthia Enloe, *Bananas, Beaches, and Bases: Making Feminist Sens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Pandora, 1989, p.1.

^② Michael Nicholson, “The Method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Steve Smith, 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ritish and American Perspectives*, London: Basil Blackwell, 1985, p.56.

有假设过两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更没有把男性统治与“男性”的生理与心理特质联系起来,如研究者不曾把女性就业中的不利地位与不公正的就业政策联系起来,也不对两性的不平等与现行制度的父权制特征进行相关研究。

女性主义强调“科学是知识的某种表达途径”这一现代理念强化并推动了科学 这是指“发现”与“证明”并重的科学。当今人们越来越习惯于遵循传统科学理论推崇的正义价值标准 但这些标准 被制订出来主要为了回答有关自然和社会生活的问题,并阻止人们对科学方法的信念进行细究^①。女性主义的经验论方法不仅将一些传统理解的“歧义”问题带进科学 而且也关注当代女性主义理论中自相矛盾的内容——既渴望引起社会的关注、希望社会听到她们的声音 渴望抵抗男性思潮成为主流 又渴望与科学保持一致 同时 创造一种思想方法……使得女性能够更多地控制自己的生活状态^②。这种充满女性特征的经验主义方法,使女性主义正义论具有独特的经验色彩。

2 立场论方法与女性视角

立场论方法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项特殊成就,它的出现旨在审视父权制社会的知识体系。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必须否定人类知识的客观性和全面性 以了解“认识论本身就是特殊社会关系的产物”^③,不仅知识的内容受人类特殊经历与客观关系的影响,而且学

① Sandra Harding, ed., *Feminism and Methodology: Social Science Issues*,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184.

② Sandra Harding, *Whose Science? Whose Knowledge? Thinking From Women's Liv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p.5.

③ Nancy Hirschmann, *Rethinking Obligation: A Feminist Method for Political Theo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67.

习知识、孕育知识的方式也受制于这种经历与关系。据此，女性主义拒绝那些所谓“纯粹真实的”知识，而是从女性地位出发，寻求一种宽容的哲学与科学理论，选择那些已遭到批判与排斥的观点和思维方式，重新探寻包容女性的观点与经验的理论起点。

2.1 “受压制的”立场与观点

在具有父权制特征的现代理论中，对人类生活与人类关系的描述存在着各种曲解与误解，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性别意识的缺失。这种知识体系总是从男性的生活经验出发界定女性地位与价值，其分析的立场成为所有知识的出发点，对女性的思维方式已经构成一种“定式”。她们在思考性别正义问题时，不自觉甚至自觉地遵循男性确定的观察视角。例如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基本上认同传统自由主义的立场，这给女性主义重新审视传统正义论带来困难。

女性主义的立场与女性的生活经验具有直接关联。它关注女性生活的实际地位，而不是那些主流社会普遍接受的生活状态，进而告诉我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一些“受压制的立场”往往是“更受人欢迎的”，因为原则上说，这些立场最不能容忍有人否定知识批评与解释中的全部精髓。^①男性主导的科学标准一直排斥女性的生活经验，长期压制女性主义的立场与观点。

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观察世界意味着什么？哈特索克和赫希曼是这样回答的：

一种立场就是一种视角。如果你愿意，你就可以从这种视角出发观察世界、观察社会关系、观察现实。这种立场由各种因素构成，如种族、阶级、性别以及人们从事的各种工作，我还可以再将性别心理的发展列入其中。立场论的

^① Donna Haraway, “Situated Knowledges: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 *Feminist Studies*, Vol. 14, No. 3, 1988, p.584.

观点是指不同的人可以根据他们的经验和背景形成不同的知识构架。……从某种程度上说,某一特殊群体拥有相同的社会和政治的重要特征 例如妇女 她们拥有相同的立场。既然认识论总是以一种复杂而又矛盾的方式发展的,并且总是来自于母亲的生活经验 那么,“立场”就可能以一种反映经验的特殊方式建构特定的认识论。^①

正如我所说的 如果人们的经验是不同的 那么根据立场论的观念 那些在母亲单方抚养下成长的男人和女人 其认识论的取向肯定存在差异。^②

当然 女性主义的立场不等于“女性的”立场 也不是所有女性都会“自然而然地”拥有它。但是 赫希曼认为这是一种必须接受的立场 至少必须得到承认。哈特索克则称之为“占领着的”地位 也就是说,这不仅是一种无意识的偏好,而且也是我们必须为之抗争的立场。女性主义的正义理论就是通过分析女性的经历 认同、表达并解释这一立场,进而赋予女性经验某种政治意义,使性别问题政治化。在哈特索克看来,女性主义的理论设计本身就是“政治斗争的一部分”女性参与这一斗争正是为了获得女性平等的政治目的。

立场论方法能告诉我们,可以从多种视角观察社会。女性主义者承认 女性主义的立场不一定是完全“客观”的 但是 作为被压迫者的一种立场 它能让我们看到正义问题的不同表现 例如 在理解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时,无产阶级能够看到资本家发现不了的问题 在理解性别关系时 女性能够比男性更深刻、更全面地理解男

^① Nancy Hartsock; “The Feminist Standpoint: Developing the Ground for a Specifically Femin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Sandra Harding and Merrill B. Hintikka, eds., *Discovering Reality: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Epistemology, Metaphysics, Method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Dordrecht: D. Reidel, 1983, p. 117.

^② Nancy Hirschmann, *Rethinking Obligation: A Feminist Method for Political Theo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67.

女关系的本质。由于男性总是拥有特权，男性主导的性别制度左右着性别关系，这就使得男性理论家意识不到性别关系中存在的偏见。哈丁曾概括过这一特征：“客观地说，正如没有一个白人愿意放弃自己的种族特权一样，没有一个男人愿意放弃自己的性别特权。从这些特权获益的人不会考虑那些为此付出代价的人的愿望。”^①期望男人们来解释性别不平等的原因，如同一个美丽的神话，实际上是不能当真的。即使在他们专门探讨性别正义问题时，也很难真正表达出性别故事的真谛。因为男人们无法体验女性的生活经验，也没有从这种经历中遭受过任何苦难。

女性主义的立场论方法来自女性的特殊经历，具有女性的性别特征。哈特索克称之为“女性主义的”而不是“女性的”。这种方法对各种科学理论抱有怀疑态度，认为即使是“好的科学理论”也无视女性地位，把女性看做母亲、家庭料理者、务农者、照顾者等角色。立场论者认为，女性的实际活动既延续了人类种族，也为知识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源泉。这些知识包括人际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个人与政治的关系等。尽管男性理论家把女性的角色行为和认知方式贬低为“本能的”、“直觉的”、“情绪化的”，进而把女性从正义领域中排除出去，但事实上，女性在自身发展的历史上，一直为争取平等的言论权、认知权和自主身份而斗争，她们对政治活动与理论建构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女性主义的政治哲学需要转换立场与视角，从女性真实的生活状态出发，挖掘女性在政治领域中的实际地位和作用，以对抗那些具有至高特权的“男权”知识立场。通过女性主义的立场论方法，可以清除正义论中原有的性别偏见，恢复女性在正义领域与政治哲学中的地位。

^① Sandra Harding, ed., *Feminism and Methodology: Social Science Issues*,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658.

立场与观点直接影响人们对两性不平等关系的理解与评价。在契约论中 理论家们强调 女性与男性在政治领域中的从属与统治关系是双方共同选择的结果，以此证明女性服从男性是出于自愿的。由于传统正义论建立在男性立场之上 因此 掩盖了女性受压迫的真实地位。玛丽·戴利认为 父权制和男性的统治地位已经使所有的生活“殖民化”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基本的压迫形式 至今仍然无处不在，女性遭遇的性别压迫就是最好的说明。摆脱这种压迫就要逃离男性世界 远离这个上帝主宰的世界 即以上帝为父的父权世界 女性需要寻找有效的途径 以使自己从严酷的父权统治下解救出来 追求天性与自由。

就此而言，女性主义的立场论方法与经验论方法是一致的。两者都认为从女性实际参与公共活动与理论研究的能力来看，足以说明女性的传统角色定位是一种束缚。她们长期从事私人领域的活动 要么栖身于‘男人’的世界 远离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所谓‘人人平等’的环境 要么栖身于‘低人一等’的社会环境 被标志为‘另类’。这也是立场论方法与经验论方法的共同之处，它们不只是关心女性为什么会成为‘女性’也不只是关心女性究竟应该做什么 而是共同探索女性的生存价值。

立场论方法从透视女性的生活开始 不仅因为这样的出发点可以纠正性别偏见 而且还因为‘与由拥有特权的男性所进行的社会构建相比 这种起点可以使我们创建的社会结构具有较少的错误 较少的偏袒和歪曲’^①。换言之，虽然女性的生活受到限制，但从更高层面考察，“这种不公正状况导致了某些肯定的行为”^②。由此也可以看

^① Sandra Harding, *Whose Science? Whose Knowledge? Thinking From Women's Liv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p.185.

^② Naomi Black, *Social Femin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p.67.